

我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价值、困境与突破

王怡*, 毕洋铭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1731)

摘要: 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 公众参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 公众的有效参与仍面临着诸多亟待化解的困境。本文通过对社会价值、存在价值和制度功能的分析, 深入探讨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价值, 比较了不同角色定位下公众的参与目的与参与类型的差异, 剖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公众参与界限与制度保障方面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须确立公众参与原则、明确公众参与的主体与范围、完善制度保障、健全配套措施, 方能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 提升政府公信力, 实现公众的食品安全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 价值分析; 困境突破

Valu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WANG Yi*, BI Yang-M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ivil rights aware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effect,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cial value, existence value and system function,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d the valu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urposes and types under different role positioning, and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boundary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On this basis, it wa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larify the subject and scop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mprove the system guarantees an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China's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pattern,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and realize the public's food safety interests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FX041)、四川省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项目(SC21FZ005)、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2RKX0184)

Fund: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6CFX041), the 2021 Project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Sichu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C21FZ005), and the Soft Science Project of Sichuan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22RKX0184)

***通信作者:** 王怡,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危机管理。E-mail: jasmine980@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Yi,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o.2006 Xiyuan Avenue, Hi-tech West District, Chengdu 611731, China. E-mail: jasmine980@163.com

KEY 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food safety; value analysis; dilemma breakthrough

0 引言

公众参与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主要通过表达意见、反映利益需求等方式参与决策。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为推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2020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提出“强化社会共治,开展‘随机查餐厅’活动”“由市民决定检查区域、检查店铺及检查项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针对我国纷繁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推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益与政府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满足了公众对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但受限于主体定位模糊、参与方式单一、制度保障不完善,公众参与往往陷入“虚置”状态,其应然效用被极大抑制^[3]。加快破除公众参与的困境已成为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与研究领域至关重要的任务。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价值与困境进行探索,进而提出突破公众参与困境的建议,以期凝聚食品安全治理共识、形成食品安全共治合力提供理论参考,助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价值

价值体现为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与有效性,价值观势必影响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功能结构的模式。

1.1 公众参与的社会价值

公众参与是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的必要手段,也使政府决策更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公众对食品安全事务的参与基于安全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其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食品安全决策关系着他们的安全^[4]。当新兴技术的发展影响到食品安全问题时,公众通常借助媒体公开质疑,自下而上、由外向内促使政府透明决策过程。政府在立法与决策时充分倾听和吸纳社会各界的声音,对公众对出台法规、政策的态度、评价及其原因予以特别关注,做到民主决策,以保证法律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主要由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和推动,具有政府主导的鲜明特征。是否采纳公众意见往往取决于领导,决策的好坏并不受民意约束。这种不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易流于形式。只有形成制度化参与,设定法律程序,才会倒逼政府将相关利益团体与各方人士

的意见纳入考虑的范畴之中,并将获取民意的方法由封闭转向公开,使决策与治理客观反映公众诉求。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的积极协作,形成合力,共承风险。

1.2 公众参与的存在价值

其一,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价值。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公众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给予其更广阔的参与空间,不仅彰显了政府对公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尊重,还能对食品生产企业与政府机关进行双重监督,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5]。其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有助于维护程序正义。如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引入听证会、座谈会等公众参与形式,同时设置公众信息的反馈渠道,可以实现公众与政府的双向沟通,强化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公众在获取充足的评估信息后,充分、公开、平等地发表见解、提出困惑与疑虑,与政府就待评估事项展开对话互动,进而在各评估环节上达成关于评估结果的共识,能够解决公众参与治理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为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的决策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4]。同时,公众对食品风险的认知是直观、感性的,其感受往往直接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公众参与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兼顾各方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6-7]。其三,公众参与的效率价值集中体现在监管的经济性。公众可以提供政府亟需的信息,节约其在资金、人力以及时间上的投入。如在监管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之间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的交流,有助于对从业者与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实现风险控制的目的^[8-9]。因此,通过发表见解、合作协商、技术人才支持等方式实现公众参与,可为监管部门提供有效信息,加深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理性认识。

1.3 公众参与的制度功能

公众参与能给政府决策和治理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本,是公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决策参与权、救济请求权的主要手段。

1.3.1 保障知情权

知情权的设立旨在改善消费者在信息获取中的弱势地位,遏制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懒政怠政^[10]。其实有赖于高涨的社会参与氛围,需要唤醒公众的主体意识。随着我国社会共治与公众参与进程的推进,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中关于公众信息知情权的界定已趋向具体化和严格化,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公众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其知情权是实现参与的首要条件。

1.3.2 维护决策参与权

决策参与权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的权利表达。食

品安全决策关系公众的生命权与健康权能否拥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政府的治理决策是否切实可行持怀疑态度。通过制度安排捍卫公众的决策参与权,发挥众长、集思广益,可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政府将公众的切身利益置于首位,鼓励公众参与决策并及时回应其需求,也易于深化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政策的理解,消除误解和愤怒情绪,使得食品安全政策能更好地被公众接受和认同。避免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群体反对,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治理与决策的信任度,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11-12]。

1.3.3 维护救济请求权

有效的司法救济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兜底保障,“有权利必有救济”。具体到食品安全领域,救济请求权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中。因此,营造良好的诉讼环境、保证公众救济请求渠道的通畅,是维护公众救济请求权的必要之举。能够为公民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提供行之有效的保障,也彰显了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及尊重人权的精神^[13]。

2 食品安全治理中公众参与的逻辑与困境

作为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公众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其功能定位的界定和参与形式的创新。如在承担生态环境产品和服务消费者角色之余,公众逐渐成为环境治理的合作参与者,通过个体参与、集体促动、舆论影响等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并利用新兴媒介加大与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沟通合作的力度,在政策制定、风险处置以及舆论监督等方面作出贡献^[14-15]。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指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在不同情境中,他们扮演着“社会公众”“消费者”“媒体”“专家”等角色,角色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其参与目的存在着差异。为实现各自的参与目的,承担不同角色的公众需要选择合适的参与类型与参与手段。

2.1 公众参与的逻辑

2.1.1 角色定位下公众参与的目的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主要包括新闻媒体、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专家学者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他们分别承担着“社会公众”“消费者”“媒体”“专家”等不同的角色。角色定位的区别决定了其参与目的不一。

“社会公众”定位下的公众是对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除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力量的总称,亦可理解为社会力量。社会公众是制度化的参与者,是与政府部门共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合作者和协商者。他们承担监督者和评议者的角色,其目的是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方针进行监督与评议,提出

符合公众利益的意见和建议。担任“消费者”角色的公众与生产经营者产生直接的交易关系,主要通过消费投诉举报参与治理。消费者对不安全食品与企业不法行为的检举揭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时效性,是精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有效途径。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消费者协会具有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旨在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咨询、参与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以及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动员其他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到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事宜中来。媒体具有即时性强、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一些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通常经媒体的曝光后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报道,可以促使行政主体采取整治手段,从而规制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16-17]。专家是指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其参与目的主要是为政府行为提供参考依据。专家作用的发挥保障了行政机关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他们在风险决策与评估时表现出科学性的优势,通过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帮助食品安全法律的确立与政策的制定^[18]。

2.1.2 公众参与的类型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类型主要有信息交流、决策参与、权利救济3种。包括意见反馈、食品安全质量监督,以及发起食品安全诉讼与申请损害赔偿。不同公众角色需要选择合适的参与手段以达成参与目的。

信息交流式参与强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常态化联系。担任“消费者”角色的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感受最为直接,也是最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发表消费意见与建议等手段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以维护自身知情权。除了政府和企业应依法向公众公开其掌握的食品信息,及时澄清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情况,要求经营者披露产品有关信息的权利。作为全新的参与途径,线上反馈信息、表达自身意见的参与方式以其简单快捷、覆盖面广的优点而备受关注。如在大众点评、美团、饿了么等网络平台上发表餐饮消费评论,对各餐饮品牌开展评价与监督,通过消费选择影响商家的名誉与收入,使不良商家得到惩罚。除此之外,消费者协会投诉和解平台也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便利渠道。消费者可以借助和解联络的绿色通道机制,在消协组织等第三方消保维权资源公正客观的介入下,与企业直接对话,达成多方协同处理,快速解决消费纠纷。

决策参与的主体包括“消费者”“专家”“媒体”等一切社会力量,公众的决策参与水平关乎其各项食品安全权益的法制保障力度。在决策参与过程中,消费者凭借其感知到的食品安全风险为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方向,专家以其专业优势进行政策问题的界定与政策方案的认定,媒体在政府与公众双向沟通的过程中起到助推作用。决策参与注重立法与制度规范制定程序的法定性。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和

政策决策程序中广泛采用听证会、座谈会、专家研讨会等参与形式。如决策听证对听证参与人的确定、听证会组织规定、听证事项以及听证责任等内容都有细致的规范,从程序上确保公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充分表达^[19]。决策参与还体现出公共性。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允许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经过公平博弈和充分讨论,使决策能符合公众健康利益。

权利救济式参与赋予了消费者食品安全诉讼和请求赔偿的权利,以补偿其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制止和惩罚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受害者,因而成为维权救济的主要参与者。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和人民检察院均可提起食品消费类公益诉讼,消费者负责对相关证据的收集与举证。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也指出,因食品缺陷而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其能够获取的赔偿款依支付的金额和遭受的损失而定。不仅如此,作为沟通政府、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媒体也是权利救济式参与的重要主体,在信息传播以及舆论引导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消费者往往通过求助热线等渠道向媒体反应自身遭遇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维权诉求,媒体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维权事件加以介绍和报道能够增加消费者维权的成功率,同时督促政府部门积极履行职责、震慑不法商家。

2.2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

随着公众参与价值认知的不断深化,公众参与对于维护食品安全的功能作用逐渐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公众参与仍存在界限模糊与制度缺陷。

2.2.1 界限模糊

参与界限模糊主要体现在对“公众参与”的概念模糊、参与范围模糊以及参与形式的功能定位模糊。首先,现行食品安全立法对“公众参与”的定位表述较为笼统。大多采取简单列举的方式对相关公众参与主体的功能与责任加以限定,概念界定的不明确性和不统一性易造成食品安全治理中公众主体定位的偏差和混乱。其次,对公众参与范围的规定模糊。在以政府主导发起议题的参与和公众提出议题的参与两种形态中,前者倾向于通过程序把参与变为操作的结果,后者的多数议题只是一些公众的行动或建议,得不到政府的反应。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治理中哪些环节必须引入公众参与?如何引入?以及公众参与主体的挑选标准和程序的说明尚不明晰^[20]。最后,对参与形式的功能定位模糊。在我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形式主要是听证会、论证会和公开征求意见等,对其功能定位非常片面,缺乏如域外公众参与中常见的公民论坛、公共调查、公共辩论等深层次的参与手段,并未实现决策机关与利益相关方的良性互动^[21]。

2.2.2 制度缺陷

权利保障缺失导致了参与“虚置”。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分别在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等方面进行了规制。但多倾向于原则性规定,对公众的参与渠道、参与的方式、救济途径以及参与实施的制度等缺乏实施细则^[22]。如面对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参与权被非法侵害时如何进行补救?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问题制度上存在空缺。此外,《食品安全法》虽对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有所涉及,但并未详细阐述公众应在什么阶段、以何种形式参与其中。

责任约束不足降低了参与的有效性。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体现出非理性、非序化的特点。缺少对公众参与动机的制约,致使部分公众仅把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作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如职业打假人为谋取利益向餐饮企业恶意索赔,或为获高价赔款而滥用举报权与行政诉讼权^[23]。在线餐饮平台上,个别消费者为谋取额外财物或其他不当利益而作出恶意评价,对平台商家的风评与收益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维权困难抑制了参与的积极性。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性任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下,部分公众仍然认为食品安全治理是政府的职责,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责任心不强,维权的主动性不足^[24]。而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要消耗高昂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需要经历收集证据、送交检测、配合调查诸多环节。面对食品维权“取证难”“检测难”“责任认定难”等阻碍,消费者最终往往陷入维权无果的境地。即使维权成功,获得的收益却相对低得多,导致公众失去维权的动力。

3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突破和建议

为了积极有效地推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须在参与原则、参与主体与范围、配套措施等方面加以突破和完善。

3.1 确立公众参与原则

广泛参与原则是充分调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保证。从参与主体的性质和类型来看,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参与主体既有公民个人,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团体或机构。公众参与不只是一般消费者群体的碎片化行为,还需要行业协会和各类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从食品安全治理的各环节来看,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不同阶段都有必要积极引入公众参与,以确保其公平公正。特别是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交流环节中,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代表性亟须提高。

平等参与原则是食品安全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在参

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时,由于公众在经济条件、文化水平以及主观意愿等方面的不同,其参与范围与程度存在个体差异。坚持平等参与原则即要求赋予一切社会公众平等的法律地位与平等的参与权利。因此,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应该保证公众在同等条件下均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

有序参与原则是界定公众参与行为的底线。体现为公众参与应当是秩序的、全过程的、互动性的参与。一直以来,在如何提高公众参与度与强调参与程序运作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是强调参与程序的严格、有序,就越能保障公正性,自然也就缺乏灵活性。行政机关在依照有关规定积极组织引导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同时,也应简化程序,降低成本。特别是在立法、决策制定和实施层面实现包括对食品安全立法的听证、食品安全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作出说明,促使参与的有序性^[25-26]。

3.2 明确公众参与的主体与范围

公众参与主体与范围的界定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公众参与需要公众通过直接与公共部门反馈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和进行公共治理。因此,须明确公众参与主体范围的两大类:公民个人和相关组织团体。公民个人作为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普通消费者、专家学者及律师等公民个体。相关组织团体主要包括新闻媒体、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等。

实践中,我国公众参与触及食品安全治理内核的参与渠道相对较少。应丰富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公众参与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如在风险评估环节,通过定期召开风险评估会,积极吸收公众代表和专家学者等参加,将公众引入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制度的修订中来;在风险管理环节,成立专业风险交流机构负责各主体的沟通与协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及群众意见反馈制度创新^[27]。特别在以食品安全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背景下,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条件,通过设立举报邮箱、开通监管机关的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创建监管微信群、手机 APP 等方式搭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政务系统,收集、整理、解答公众关注的问题,完善对公众意见建议的采纳与回复制度,确保公众意见落到实处^[28-29]。

3.3 完善制度保障

信息公开制度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前提。我国要改变公众信息获得权难以实现的状态,须督促企业切实承担公开食品相关信息的责任,涉及食品安全的产品标准、配料成分、检验检测结果要公开透明。在信息社会时代,须大力发展电子政务,优化政务公开形式,完善信息流通制度,探索对话机制、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等多样化沟通途径,做到及时更新资讯,促进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交流^[30]。

责任制度是保障公众权利正当行使的必要约束。就职业打假人而言,打假行为失范会导致投诉举报事项未切实涉及产品质量问题、向企业“敲诈勒索”等负面现象的出现。因此,需要对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作为解决食品安全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有力手段,食品安全声誉惩罚制度通过启动严厉的市场驱逐式惩罚,能对食品安全不法行为构成极大的威慑与阻吓。但公众若盲目跟风作出负面评价,甚至恶意损害商家信誉,无疑是对商家正常营销活动的重大打击。为此,声誉罚制度的建设理应突出公众的责任,需要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为核心,加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制度建设。监管部门可将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后的整改情况记入信用档案,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企业自省自新以及法律法规遵守情况的实时信息全景,为公众指明需要惩罚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制定信用评级标准,通过公正对话与协商,明确消费者组织的法定参与权责,以保证公众正当地使用声誉罚^[3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目前,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虽已确立并写入《民事诉讼法》,但其对主体资格的限定过严,并未赋予一般公民个人或团体组织直接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使得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过少。为此可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设置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赋予个人和团体组织所需的诉讼权。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减免诉讼费用、给予经济补偿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使公众能够便利地参与维权救济^[32]。

3.4 健全配套措施

一方面,促进公众组织化参与。明确社会组织的职责所在是公众组织化参与的前提,应细化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第三方检验机构和认证机构等参与主体的分工,实现食品安全行业民间组织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权的规范化。而政府的简政放权是实现公众有组织地独立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33]。行政机关应加快培育食品安全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深化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推进食品行业自律机制的建设,以保证其独立性与自主性。

另一方面,注重公众参与能力的培养。现阶段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能力还须加强。政府部门除向公众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与知识外,可利用新闻媒体、门户网站、知识讲座、基层走访等渠道宣传,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关于食品安全治理的教育工作。在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增强公众危机意识和应对技能,使其在食品安全危机中保持冷静,形成科学认知,正确应对食品安全事件。

4 结 语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在我国虽尚未形成有效制度,参与面临重重阻力,但在强调“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仍具有强烈的需求和动力。推进食品安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仅需要进一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准确性、提高透明度,还应培育公众在参与中尊重规范、主动参与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 [2020-09-29]. http://gkml.samr.gov.cn/nsjg/spjys/202009/t20200929_322096.html [2021-07-15].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Action Plan for Improving Food and Beverage Quality and Safety* [EB/OL]. [2020-09-29]. http://gkml.samr.gov.cn/nsjg/spjys/202009/t20200929_322096.html [2021-07-1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021-07-12].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line of the long-term goals for 2035 [EB/OL]. [2021-03-13].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021-07-12].
- [3] 张德森, 杜朴. 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虚置”及治理路径[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1, (1): 86-98. ZHANG DM, DU P. The “Fictitiou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fter-legislation evaluation and its governing approach [J]. *J Beijing Admin Inst*, 2021, (1): 86-98.
- [4] 刘清生. 论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制度[J/OL].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 [2021-12-18]. <https://doi.org/10.19525/j.issn1008-407x.2022.01.012> LIU QS. Research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J/OL]. *J Dalian Univ Technol (Soc Sci)*: 1-7. [2021-12-18]. <https://doi.org/10.19525/j.issn1008-407x.2022.01.012>
- [5] LEVKOE CZ, SHEEDY A. A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food policy making: lessons from Canada's People's Food Policy project [J]. *J Hunger Environ Nutr*, 2019, 14(3): 318-338.
- [6] ECKERD A, HEIDELBERG RL. Administer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J]. *Am Rev Public Adm*, 2020, 50(2): 133-147.
- [7] 张铤.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9, 35(6): 45-49. ZHANG T. Analysi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T decision-making [J]. *Stud Dialectics Nat*, 2019, 35(6): 45-49.
- [8] 顾凯辰, 常志荣, 魏婷, 等. 日本及欧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及其启示[J]. 食品与机械, 2019, 35(9): 102-106. GU KC, CHANG ZR, WEI T, et al. The exchange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risks in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J]. *Food Mach*, 2019, 35(9): 102-106.
- [9] YANG RH, HORSTMAN K, PENDERS B.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infant formula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A decade after the melamine crisis [J]. *Food Cult Soc*, 2021. DOI: 10.31219/osf.io/43r8a
- [10] 孙迎春. 加强对电商“炒信”行为的民事法律规制[J]. 人民论坛, 2019, (24): 41-43. SUN YC. Strengthen the civil legal regulation of e-commerce “speculation” [J]. *People's Trib*, 2019, (24): 41-43.
- [11] 赵晶晶. 转基因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以欧盟经验为例[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101-107. ZHAO JJ. A study on th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taking the EU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 [J]. *J Northeast Norm Univ (Philos Soc Sci)*, 2021, (5): 101-107.
- [12] HAN GH, YAN SM. Doe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affect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ir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n a national survey in China [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11): 1874.
- [13] 戚建刚, 张晓璇.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之新探[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9, (6): 91-103, 156. QI JG, ZHANG XX.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ef system for civil rights of food safety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J]. *Soc Sci Chin High Educ*, 2019, (6): 91-103, 156.
- [14] 王帆宇. 生态环境合作治理: 生发逻辑、主体权责和实现机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3): 98-111. WANG FY.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rminal logic, subjec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realization mechanism [J]. *J Chin Univ Min Technol (Soc Sci)*, 2021, 23(3): 98-111.
- [15] YAO XY, HE J, BAO CK.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s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articipation extent and conflict level [J]. *Environ Impact Assess Rev*, 2020, 84: 106400.
- [16] 彭思喜, 张日新. 食品安全应急治理体系特征、症结与优化[J]. 管理现代化, 2021, 41(1): 98-107. PENG SX, ZHANG RX. Characteristics, crux and optimization of food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J]. *Mod Manage*, 2021, 41(1): 98-107.
- [17] ZOU QL, MA JG, CHU T, et al. Value of mass media in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J]. *J Food Qual*, 2020, 2020: 1-13.
- [18] 张晏.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的界定和识别—兼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1): 127-136, 188. ZHANG Y. The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ublic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Comments on the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Measur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J]. *J Beijing Inst Technol (Soc Sci Ed)*, 2021, 23(1): 127-136, 188.
- [19] 吴明熠. 从听证走向协商: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反思与程序嬗变[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 (2): 46-61, 125-126. WU MY. From hearing to consultation: the practical reflection and procedural chang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J]. *J Gansu Admin Inst*, 2020, (2): 46-61, 125-126.
- [20] 赖锴.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法治化路径[J]. 领导科学, 2020, (14): 55-58. LAI K.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way to rule by law [J]. *Leadership Sci*, 2020, (14): 55-58.
- [21] FENG L, WU QM, WU WJ, et al. Decision-maker-oriented vs. collaboration:

- China'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J]. *Sustainability*-basel, 2020, 12(4): 1334.
- [22] 方世荣, 孙思雨. 论公众参与法治社会建设及其引导[J]. *行政法学研究*, 2021, (4): 55-68.
- FANG SR, SUN SY.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ruled by law and its guidance [J]. *Admin Law Rev*, 2021, (4): 55-68.
- [23] 辜明安, 梁田. 《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与完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12): 87-93.
- GU MAN, LIANG T.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Food Safety Law* [J]. *J Southwest Minzu Univ (Hum Soc Sci)*, 2019, 40(12): 87-93.
- [24] CHEN XJ, QIN K, WU LH. Citize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 772117.
- [25] 秦攀博. 公众参与的多维审思: 分化与融合[J]. *求实*, 2019, (6): 15-27, 107-108.
- QIN PB.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J]. *Truth Seek*, 2019, (6): 15-27, 107-108.
- [26] WU LF, JIA GS, ZHANG P.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megaprojects [J]. *J Constr Eng Manage*, 2019, 13(7): 1522-1536.
- [27] 张锋.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研究[J]. *兰州学刊*, 2019, (11): 90-99.
- ZHANG F. Study on Japan's food safety risk regulation mechanism [J]. *Lanzhou Acad J*, 2019, (11): 90-99.
- [28] 张蓓, 马如秋, 刘凯明.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食品安全演进、特征与愿景[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1): 88-102.
- ZHANG B, MA RQ, LIU KM. Food safety evolution, features and visio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J]. *J South China Agric Univ (Soc Sci Ed)*, 2020, 19(1): 88-102.
- [29] 章楚加.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利实现路径—基于权能分析视角[J]. *理论月刊*, 2021, (5): 82-90.
- ZHANG CJ.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right in major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capacity analysis [J]. *Theor Mon*, 2021, (5): 82-90.
- [30] YANG RH, HORSTMAN K, PENDERS B. Constructing the accountability of food safety as a public problem in China: A document analysi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2008-2018 [J]. *J Chin Gov*, 2020. DOI: 10.1080/23812346.2020.1796160
- [31] NIU LY, CHEN M, CHEN XJ, *et al.* Enterprise food fraud in China: Key factors identification from social co-governance perspective [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 752112.
- [32] 俞飞颖.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考量与改革路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 89-96, 125, 169.
- YU FY. Problems and reforms of China'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on food safety [J]. *J Fujian Norm Univ (Philos Soc Sci Ed)*, 2019, (3): 89-96, 125, 169.
- [33] 李静. 食品安全的合作共治: 日本经验与中国路径[J]. *理论月刊*, 2019, (4): 91-97.
- LI J.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Japan's experience and China's path [J]. *Theor Mon*, 2019, (4): 91-97.

(责任编辑: 郑丽于梦娇)

作者简介



王 怡,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危机管理。
E-mail: jasmine980@163.com